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进路

仇文利¹, 潘锦全²

(1、2.扬州职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要]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探索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础上,经历了初步探索、逐步完善、接续发展三个阶段,即从建构以思想建设为首的党建“原生”理论,提升党的领导效能,到形成增加制度建设—交替纳入政治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党建“重塑”理论,提升党的管理效能,再到创建以政治建设为首、纳入纪律建设的党建“再重塑”理论,提升新时代党的治理效能,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对党的建设实践经验进行了理论概括与高度凝练,展现了党建理论从“原初内容”走向“理论重塑”的动态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建构是科学的党建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分析和把握其逻辑进路对我国完善治党体系和提升治党效能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引领价值,对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建构;逻辑进路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08(2020)08-0025-09

DOI:10.16133/j.cnki.xxlt.2020.08.004

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的解答,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2016年3月,习近平提出要“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2018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高端智库作用的意见》,向广大党建理论研究者明确提出新时代“积极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指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在本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关于党的建设的系列理论成果,包括基本经验、基本思想、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等方面的内容。“新时代提出新课题,新课题催生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新实践创造新成就”^[1]。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由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和反腐倡廉等建设理论组成的党建科学理论体系,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推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主体自觉和创新能力。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对我国完善治党体系和提升治党效能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引领价值,对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初步探索:建构以思想建设为首的党建“原生”理论,提升党的领导效能

理论创新来源于实践探索,并对客观实践具有指导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

[收稿日期]2020-05-16

[基金项目]本文受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资助,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建国以来党的专题教育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研究”(19DJD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1.仇文利(1969—),女,江苏扬州人,博士,扬州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江苏省“333工程”高层次人才,扬州市党建理论研究院研究员;2.潘锦全(1970—),男,江苏射阳人,博士,扬州职业大学校长、研究员,扬州市党史学会副会长。

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2]。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是解决问题的武器,只有敢于直面问题、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理论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党建思想,主要涵盖了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内容,它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探索和党的自身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共产党党建原初理论,着力解决了思想统一、方向引领和组织保证问题,提升了党对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效能。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初步探索,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建构迈出了第一步,也意味着党的领导人开始对党的建设进行系统谋划和科学设计。

(一) 将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各种方式的思想教育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形成思想建党理论

思想建设对党的建设性质和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对我国革命和建设也起着方向引领作用。毛泽东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党理论,强调党员在组织上入党的同时,在思想上也要入党,必须经常注意通过各种方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剥削、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彼时为了积聚革命的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大量吸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导致党内出现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针对这一现实状况,毛泽东明确指出要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否则,农民占绝大部分的党最终会走向灭亡。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党通过有组织的集中学习、整风运动和干部培训等多种形式,强化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想信念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帮助他们清除掉污泥。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教育、思想教育的内容是什么、怎样进行思想教育的问题。在 1929 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和后来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主张通过教育来克服种种不正确倾向,“使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3]。“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始终是他思考的问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

东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4]。党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成为全国人民的代表,必须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巩固。全体党员行动上的统一来自思想上的统一,思想上的统一主要取决于思想教育。毛泽东认为党内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或完全没有入党。鉴于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强调思想、组织整顿的必要性和两者的关系,认为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之间的思想斗争不可避免,明确阐释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内涵。延安整风运动使得毛泽东建党思想得以付诸实践,党员有了一次集体教育和改造的机会,为党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5]。坚持以解决党内实际问题为目的,以多种方式对党员、干部开展思想教育,自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提高党员党性修养、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提高领导效能的重要举措,也形成了党的思想教育理论,成为党建“三位一体”“原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任人唯贤”选拔干部,形成党的组织建设理论

党的领导力量在于严密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有着严格纪律要求的政党。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创新,在中国扎根并得到发展,成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毛泽东认为,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6]的民主集中制是党在伟大斗争中增添新生力量、攻克战争难关的组织武器,有利于解决党内自由放任主义的错误倾向问题。结合党内民主建设的现实状况,他强调,要必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充分发挥人民的革命意志,也要建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府。“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

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7]。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制定离不开民主,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也离不开民主,民主是真正集中的基础,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严格执行,铸造了我们党坚强的组织纪律性的政治品质。史实显示,伟大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伟大的党的领导,也需要有许多好的干部和高质量的党员。“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选拔任用路线,在用人上坚持德才兼备的具体标准。他强调政治是第一位的,各行各业的干部要具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知识,要有政治远见,“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9]。实践证明,毛泽东选人用人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党的干部必须保持“又红又专”、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政治本色,强化党的政治功能促进了党的组织力、领导力的提升。党组织的力量不仅来自党员干部,更来自党员的质量。鉴于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地方发展党员只“注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错误方针,党中央要求慎重做好党员发展工作,严把“入口关”;毛泽东提出要有重点有步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刘少奇则首次提出公开建党的建议;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接受新党员的规定》,提出严格入党的要求和程序。由此可见,严密的组织性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战胜敌人的重要法宝。

(三) 提出“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主体”论断,以党的严明纪律反对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形成党的优良作风理论

党的领导力量源自以优良作风凝聚人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人民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毛泽东不仅提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而且强调并践行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定地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曾多次指出,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要做到“四不要”,忌存在自私自利、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懒惰消极、宗派主义等四种现象,并提出以反对主

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来整顿党风。我们党开展延安整风运动,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首次明确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之下形成的这三大作风,充分体现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自身特色。他主张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和对党员干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来改变、完善党的作风,对此创造性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论,强调批评缺点与错误是为了更好的救人,并非把人整死。换言之,党内思想斗争的开展是要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国内外形势的较大变化和党所处环境与自身政治地位的根本性变化,部分党员干部难以适应且抵御诱惑能力不足,在思想和工作作风上发生变化,出现脱离群众、骄横跋扈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不良倾向。为此,毛泽东号召在党内进行一次改善党群关系的大规模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两个指示,显示了党中央开展整风、整党运动的决心。1951年12月,党中央、毛泽东针对整党运动中的突出问题,又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多次提出“两个务必”的警言,提醒党内同志不要被敌人的“糖衣炮弹”诱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经过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11]。通过整风运动,党员、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性修养与思想水平上有了明显提高。

此外,毛泽东还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党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加以考虑,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12],建议以党内法规的制定与执行来统一与规范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历史证明,源于实践的毛泽东党建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中

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基于自身发展历史与现状,在八大会议上沿袭七大上毛泽东提出的“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13]的建党路线,规定“在党内不容许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14],同时对党建工作和反腐倡廉提出了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加强的新思路。

二、逐步完善:创建增加制度建设—交替纳入政治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党建“重塑”理论,提升党的管理效能

“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15]。改革开放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实践中逐渐得到完善。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党建经验教训、广泛听取民众意见的基础上,决定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党建新路子,不搞政治运动。自党的十三大报告将制度建设和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在形成“四位一体”的党建新布局后,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创新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内容,交替将政治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形成“五位一体”党建理论。“四位一体”党建理论的形成到“五位一体”党建理论的逐步完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第二步,不仅重塑了党建理论的内容,且进一步生动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中国共产党管理国家能力提升的问题。

(一) 增加制度建设,形成“四位一体”党建理论

总结历史经验,强调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是党建质量和执政稳固的决定性因素。从中国革命到改革开放,邓小平始终强调制度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颜色的问题,全党应该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16]。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阐述了制度治党治国思想,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

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17]。他认为党规党法和国法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制定要同时并进。邓小平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出发,强调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还提出要把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认为这些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好的制度对坏人能起到约束作用,不好的制度对好人也会起到不好的作用。邓小平从国情党情出发,指出社会主义是好的,因此,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他所言“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18]。其次,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具有中国特色、民族特色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为了发挥党的领导这个优越性,狠抓党的制度建设,首先以修改完善党章为抓手,建立健全党规党法。党章是党内的根本大法,在邓小平看来,九大、十大搞的党章不够完善,在党员权利和义务、党员标准等方面都没有规定好,需要进一步修改。他对党章的修改提出了总的要求,认为要对执政党的性质、党员的标准、党的领导能力做出明确规定。此后,党制定了对党章做了具体补充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坚持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监督制度等制度,邓小平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要求。1987年,党的十三大则正式把制度建设纳入党的“四位一体”建设版图,他强调指出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19]。制度问题解决了,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问题也就解决了。但在各方面要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定型的制度并非一蹴而就,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认为至少还要有三十年的时间。不过对此他非常自信,认为只要

我们不断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因素、借鉴文明成果,我们的制度会逐步完善起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实现党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邓小平强调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是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关系的正确把握与统筹规划。

(二) 交替纳入政治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形成“五位一体”党建理论

审时度势,把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理论范畴。纵观党史,党的政治建设并未一直出现在党的建设布局中。发生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政治风波,意味着弱化党的政治建设必然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问题,邓小平对此严肃提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0]。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强调指出党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这四个方面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由此可见,政治建设和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并列出现在党的建设论述中。虽然党的十四大未对党的政治建设做出具体部署,但由此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一道成为十四大之后到十五大间构成的“五位一体”党建战略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对党的建设做了总结,提出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要总结我们党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也要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21]对政治的再次强调,足以证明,党中央对政治建设的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布局的调整与党的实践紧密相连。1995年9月,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强调,讲政治是领导干部必备的素养,“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高级干部要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22]。他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政治”的内涵,着重强调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讲政治、讲政治纪律。可见,江泽民对党员干部政治上的要求并非仅仅局限于党的自身建设范畴,而是通过具体业务表现出来。为深入领会、践行其考察北京市工作时提出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简称“三讲”)的要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定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三讲”教

育活动,主要以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干部为教育对象,以提高干部的 leadership 水平,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意识教育为目的。新时期党对自身政治建设的探索在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的几年里,继续得到深化与巩固,使党风得到进一步改善,实现了党的政治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飞跃。

顺势而为,把反腐倡廉建设纳入党的建设理论范畴。随着世情、国情和党情的进一步发展,反腐倡廉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构建“惩防一体”反腐败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追根溯源,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邓小平对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和权力滥用问题就给予了警告,但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未加以重视,走上了腐化堕落道路。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通过教育和法律两个手段来解决。他认为在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的同时,要加强党内和国家立法,建立健全法规制度体系。任何违法的人不得逍遥于国家法律之外,任何违反党纪的人不得逍遥于党纪之外。由于腐败与权力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因此,腐败问题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面临且重视的共同课题。江泽民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任重道远,决不能有任何的松懈。“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23]。“在反腐败中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2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主题,坚持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来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针对党内腐败问题,对全党多次提出要求,并强调了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分别强调了反腐倡廉对党、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实现了反腐方针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25]的扩展。党的生死存亡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息息相关。只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抓好、抓实,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只有在党群关系和谐的基础上,党的执政能力才会得到提升、执政

地位才会得到巩固。胡锦涛提出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防一体”反腐败体系,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将党的建设调整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五位一体”布局,反腐倡廉建设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概括与高度凝练。后又在十七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反腐倡廉建设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他指出,党的“五大”建设相辅相成,构成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有机整体,每个方面都必须抓紧、抓好,否则都会影响党建工程的全局。在十七届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他首次提出“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26]要求,凸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在新时期党建总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不仅提出全面加强党的“五大”建设,而且强调要增强“四自”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7],始终确保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直到党的十九大前夕,党的“五位一体”建设在内容上没有变化,先后顺序有所调整,制度建设置于反腐倡廉建设之后,逻辑层次关系更为科学。综上所述,无论是制度治党,还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它们都突破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生”理论,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升党的国家管理效能。

三、接续发展:创建以政治建设为首、纳入纪律建设的党建“再重塑”理论,提升新时代党的治理效能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永恒的话题,是需要常做的功课。“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才能更好走向未来”^[28]。新时代,党中央依据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以“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为遵循,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努力构建“5+2”党建理论格局,创新了前人的党建思想与实践。构建党的建设“5+2”格局,是应对重大风险考验和解决党内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全面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和党建质量的内在诉求,是深入推进党

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建构的第三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一个动态的科学理论,今后还将不断接续发展,实现党建理论内容的再重塑。

(一) 将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再重塑”党建理论内容

打破常规,第一次把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在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这段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虽始终未出现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但党中央并未忽视自身的政治建设和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纪律与党性修养的要求,党先后开展系列教育活动,表明党对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执政能力建设的始终重视。党的十九大强调对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的全面推进,以制度建设为主线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将党的建设布局调整为“5+2”,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内问题的时代回应与顶层设计。“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29],“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30]。新时代把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第一位,凸显政治建设的首要位置,强化全体党员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教育,且对其言行举止加以制度约束,是预防党内腐败现象“死灰复燃”、破解党的权力利益固化、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在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政治建设的统领性、根本性的地位对党今后建设方向和其他建设效果都至关重要。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必然遵循其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其他建设也会内在包含其实质内涵,把党的政治建设单独列出并放在首位,则显示了党中央对这些内容的高度重视,也显示了这些内容的重要性。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首先是要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处于全党核心地位的领袖,就很难形成统一的意志,在关键时刻就不会有战斗力。因而,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是对我国“富起来”时期形成的党建理论内容的“再重塑”。

(二) 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相结合,深化党建理论内在关系

协同发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重视思想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规定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须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习近平对党员、干部提出要求,“要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31]。在建党初始,毛泽东传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理论,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论断。事实证明,思想理论教育不到位,对党对国家的治理与发展都极为不利。习近平曾强调指出,党员干部“有的置若罔闻,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团团伙伙,一门心思钻营权力”^[32],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因而,他强调,“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33],即思想上统一的党在行动上必然也是高度的统一。当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科学的理论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就能发挥指导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列宁强调,一个政党没有革命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先进的战士,就不会坚强有力。中外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证明,只有开展常态化、制度化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才能增强全体党员的党性修养,提升全体党员的思想境界,始终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牢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多次多种形式的党内教育活动,并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既体现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协同互动,也体现了对习近平关于思想教育与制度落实相结合、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重要论述的践行。“思想是灵魂,制度是筋骨”。思想建党对制度治党起到了价值支柱与观念指引的作用,制度治党对思想建党起到了有力保证的作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协

同发力,可以为党的政治建设奠定重要基础,为提升党的组织力提供根本保障。

(三) 纳入纪律建设,创新党建理论内容

适势求是,纳入纪律建设。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把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使得党的建设内容更为丰富,也拓展了党建格局的范畴,“5+2”党建理论形成。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就是以强化政治、组织纪律为重点,带动其他纪律的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是有着严明纪律优良传统的政党,第一个党章就对纪律做了明确的规定,违反了六种纪律要求的党员必须开除出党。中国的革命实践、建设探索和改革开放证明,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重要保障”^[34],党的纪律建设的不断推进有助于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曾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只有依靠理想和纪律这两个武器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全体党员对党的纪律的严格遵守,才是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才能起到团结、组织的作用。江泽民也曾指出党的纪律对党的团结统一的维护,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增强,纲领、路线和任务的实现,具有重要保证作用。他认为组织纪律是我们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条件,党组织或党员如果无视组织纪律就会丧失战斗力,甚至会瓦解。因此,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把党的纪律作为自己言行的遵循。党的纪律是一套系统的制度体系,它包括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和生活六个方面纪律的相关制度。“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35]。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内因纪律执行不力所引发的问题,习近平再三强调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因为政治纪律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只有对党的政治纪律遵守了,才会对党的全部纪律遵守。现实中,一部分党员和党组织由于对党的纪律重视程度不够、了解不多,因而做了违纪的事情。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应把“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作为自己的基础性工作,做好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培训教育,

让党员、干部养成在监督和约束环境下正常工作生活的习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正是给自己立下了诸多合法的“规矩”,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在我国逐渐“强起来”的新时代,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总体布局,和其他建设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创新党建理论内容,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升党的治理效能的可靠路径。

(四)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构建“5+2”党建理论

统筹兼顾,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党的建设方面,首先回答了“为什么必须反腐败”的问题,认为党内腐败问题越演越烈,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政治危机。因而,在“怎样反腐败”问题上,他传承创新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提出用“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点面结合、整体推进”等举措开展反腐败斗争;在实践上,党中央不仅“老虎”“苍蝇”一起抓,实施“天网行动”,进行高压反腐,而且从预防角度系统考虑,努力构筑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防线,现已取得压倒性胜利。习近平关于补足精神之钙、扎紧制度笼子、完善法治体系、利用网络渠道等反腐的重要论述,实现了反腐策略、制度、路径和主体的创新。党中央在从严惩治贪官污吏的同时,在党内开展各级各类教育活动,加强理想信念、价值观、家风等教育,是对习近平关于补足精神之钙重要论述的贯彻落实。“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36]。换言之,制度反腐是标本兼治的最终落脚点。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反腐败斗争还需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与监督的积极作用,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有机结合起来,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已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人民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性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采用合法的监督方式,相关制度必须建立

起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健全势在必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2017 年工作规划》的印发,推动了彼时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统筹规划,多措并举,整体推进,形成反腐的强大合力,党内的腐败行为也就无处可藏,以良好党风推进廉洁政治建设也必然成为一种趋向。十九届中纪委四次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反腐败斗争的方针:“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37]由此判断,完善重点领域的监督机制和体系,推进相关制度建设,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38]的重点。依规治腐、依法治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依据实际情况确立自己的反腐败斗争任务,恰恰说明了新时代“5+2”党建理论的构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综上所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规律和“三大规律”而形成的科学的、系统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既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又有丰富的社会实践,在动态发展中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和革命基因。党建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升了自己的领导力,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并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中国共产党要真正成为 21 世纪国际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还需要继续“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39],解答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用科学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指导自身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关键期,进一步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建设,对提升治党治国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塑造党的国内国际形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
-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 [3]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3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50.
- [4][8][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526、605.
- [5][6][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94、1057、1031.
- [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1.
- [9]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77.
- [1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4.
-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86.
- [1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24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8.
-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7.
- [16][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6、314.
- [17][1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133.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0.
- [21][22][23]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10、457~458、326.
- [24]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0.
- [25]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74.
- [26]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8.
- [27]胡锦涛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53.
- [28]祝捷,伍华军.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关键词[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 [29][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2、62.
- [31][3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61、113.
- [33][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80、151.
- [34]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6-10-28.
- [36]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125.
- [37][38]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20-01-16.
-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97.

[责任编辑:王张强]